前　言

聚落，中国古代一般指村落或人们聚居的地方①。它作为自然、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定居村落即聚落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巨大成果，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进步之一，具有与农业的起源和新石器革命同等重要的意义。定居村落的出现，大大拓展了人类的居住和活动空间，为人类人口的增长、社会组织的发展，乃至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开展聚落研究，越来越受到地理学界、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

地理学界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已开展聚落研究，以至于后来最终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聚落地理学②。然而聚落地理学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现存聚落平面关系的考察，既无法考察聚落出现的最初形态，也无法复原聚落嬗变的轨迹，所以，在研究人类早期聚落尤其是史前聚落时，只有运用聚落考古学方法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才是解决这一课题的正确的途径。我国的聚落考古始自本世纪 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 80年代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③，进入 90年代以后，区域性聚落考古方兴未艾，成为我国聚落考古的新动向。如今在我国东北地区、黄河下游地区、江浙地区、四川盆地、内蒙古中南部以及西北地区等地，都相继开展了

①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走向 21世纪的考古学》第 107页，三秦出版社，1997年。

②金其铭：《农村聚落地理》第 1页，科学出版社，1988年。李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第 15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走向 21世纪的考古学》第 106页，三秦出版社，1997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聚落考古调查和综合研究工作，接连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课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跳出从概念出发的怪圈，试图从具体材料中探求中国文明起源及其形成的过程。不过，具体材料浩如烟海，究竟从哪些材料入手，却是大有讲究的问题。我们认为，既然聚落在古代遗存中既具有综合性代表性的特点,又具有可操作性,那么,从聚落考古入手,探索聚落演变的轨迹,从而揭示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应不失为一计良策。从何处入手进行聚落考古研究呢？我们认为应选取那些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过程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聚落考古资料又已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地区作为切入点。通过类似的一个个特定地区的个案研究，最终才能把整个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说得比较清楚、比较具体。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目光首先投射到中原地区的腹地——伊洛郑州地区。这里不仅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源地,而且已经积累了自裴李岗文化至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大量考古资料。从事聚落考古研究的前提——区域文化编年已经大体建立。

之所以选取郑洛地区,更重要的还是由于这里是夏商周三代都城所在地。成熟的三代青铜文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夏代之前,郑洛地区是如何一步一步逐渐演化成中国最早的青铜文明诞生地的？这对于每一位渴望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们,无疑是一个长挂于心的谜团。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我国史前聚落发展史和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均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也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伊洛郑州地区，有意识的聚落考古工作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声势微弱。有鉴于此，本文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作一粗浅的分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之上，从聚落演变的角度探索郑洛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过程。

第一节　郑洛地区聚落考古工作概述

首先让我们对郑洛地区聚落考古出现以前的考古工作作一简单的回顾。自 1921 年 10 月安特生首次发掘仰韶村遗址到夏鼐于

1951 年 6 月再次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头 30 年,郑洛地区考古工作的重点局限在渑池县境内仰韶村及其附近的几个遗址，加上郑州、荥阳、广武等地调查所得,总共只发现十几处史前遗址[①],聚落考古意识尚未形成，也就谈不上聚落考古工作的开展。大约自 1952 年起，直到 60 年代中期，经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物考古部门的调查和发掘，在郑洛地区新发现了大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并最终确认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早晚关系，彻底澄清了自安特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认识。此外徐旭生于 1959 年率先开展寻找“夏墟”的工作[②]，拉开了郑洛地区探寻夏文化遗址的序幕；另有个别学者已注意到了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分布特点[③]。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距真正意义上的聚落考古还有很大差距。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全国文物考古机构基本上停止了业务活动，直到 1972 年，各地文物考古工作才逐渐恢复正常，郑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也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聚落考古工作亦开始启动。

依据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的进展可将郑洛地区聚落考古工作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约自 1972 年到 80 年代中期,第二阶段大约自 80 年代中期以后直到现在（1998 年)。第一个阶段,是郑洛地区聚落考古的起步阶段。郑州大河村、登封王城岗、新郑裴李岗和密县莪沟北岗等遗址的大面积揭露，标志着郑洛地区聚落考古工作的正式起步。之所以将郑洛地区聚落考古第一阶段定为从 1972 年开始，是因为郑州大河村遗址的发掘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进行的。1972 年即大河村遗址发掘的第一年，就发现了编号为 F1－4 的分间房屋，发掘者当即编发发掘简报，详细报导了这四间房基的建筑方

① 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夏鼐)：《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2 卷 9 期,1951 年。

② 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第 11 期。

③ 史念海：《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人文杂志》1959 年第 3 期。

法、建筑结构以及房基内出土遗物的分布等具体内容[①]。这一重要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至 1975 年底,连续对大河村遗址进行了七次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发掘者根据遗址的文化内涵和自然地貌，将遗址划分为五个发掘区，先在遗址的中部和西部即第Ⅰ、Ⅱ、Ⅳ 三个发掘区中发掘了 1500 平方米左右,遗址北部和南部暂编为Ⅲ区和 Ⅴ区,以便后续发掘。根据发掘、钻探资料和农田水利工程中采集的遗物分析，发掘者了解到，遗址中部是新石器时代的居住区，其中以仰韶文化层堆积最厚，边缘地带文化层较薄，而且多为龙山晚期和商代遗存；另外,在Ⅳ区的北半部和 Ⅰ区的西北部发现两处原始氏族公共墓地。'[②]大河村遗址的发掘自 1972 年至 1985 年，前后进行了二十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约 5000 平方米[③],发掘工作一直是按照五个发掘区的规划进行的，发掘目的已不再单单是为了了解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对于房屋建筑结构和遗址当中文化遗存的总体分布状况同样予以重视。无论是作业方式还是具体研究内容，事实上已经具备了聚落考古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可以把大河村遗址的发掘作为郑洛地区聚落考古的开始。不过由于大河村遗址文化堆积较厚，部分探方发掘深度竟达 12.5 米,文化内涵包括仰韶、龙山、二里头和商代四种文化遗存，每一种文化遗存又可进一步分为若干时期，光是仰韶文化就可以分为七、八期[④],发掘者在发掘和研究过程中没能充分注意到应分期甄别文化遗存的共存关系，也未能对大河村遗址当中各个时期的聚落形态进行深入研究。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郑洛地区聚落考古工作刚刚开始,尚未产生发掘遗址全貌的意识的话,到了 1977 年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时，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县告成镇

①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的房基遗址》,《考古》1973年第 6期。

②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 3 期。

③ 郑州市博物馆:《1982、1985 年河南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发掘》,《考古学集刊》(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④ 《考古学集刊》(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西约一公里的五渡河西岸台地上，实为八方村遗址的一部分。早在1951年3月，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赵全嘏即来到告成八方村遗址调查，他认为告成即古阳城地，传为夏禹建都的地方，调查后指出位于颍河及其支流奈（五渡）河交汇处的八方村遗址面积极大[①]. 1956年文物普查时，仍定名为“八方村龙山文化遗址[②]”。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调查“夏墟”时，根据文献记载确认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尤其是颍水上游登封、禹县一带是夏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并于1959年4月27日至5月2日在告成镇及八方村进行钻探和调查，根据地面调查和钻探的材料，认为“遗址大部分在告成到八方的公路北面，小部分在南面”，遗址“东部似以龙山为主，兼有早殷遗物；西部似以仰韶为主。但东西均有仰韶、龙山的陶片。”遗址取名为“告成八方间遗址”。[③]1975年春，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组成探索夏文化工作组在告成村以西和八方村之间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钻探，确定所谓“告成西区”遗址面积约56万平方米，在此范围内除包含仰韶文化遗址和二里岗期文化遗址外，也包含有相当丰富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存。[④] 由此可见，直到1975年，王城岗遗址仍然只是作为八方遗址（又名告成遗址）的一部分来看待。为了进一步探索夏文化，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遂于1977年上半年开始对告成遗址进行调查和小规模的发掘，其重要收获是在五渡河西岸群众相传为“王城岗”（遗址东北部一片高台地）的地方，发掘出一段南北长20余米的龙山时期夯土墙，从此以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上来，告成遗址的其他部分基本被忽略了[⑤]。依据1977年上半年的发掘和对周围龙山、二里头文化遗址的

① 赵全嘏：《河南几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报导》，《新史学通讯》1卷4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③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④ 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1977年上半年告成遗址的调查发掘》，《河南文博通讯》1977年第2期。

⑤ 同上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调查,发掘者愈加相信,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就在告成附近,而王城岗龙山城址可能就是夏王朝初期城垣的遗迹。这些发现和认识极大地激发了发掘者揭露王城岗城址原貌的积极性，虽然王城岗遗址也是一处多种文化遗存互相叠压的遗址，内含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然而发掘者目的明确，就是要揭露龙山城堡原貌，因而着重发掘龙山城墙和城墙以内的遗迹，于是自 1977 年下半年开始，沿着已发现的城墙延伸方向顺藤摸瓜，先发掘城墙,后发掘城墙内的各种遗迹,至 1981 年春,在这里共发掘遗址面积 8575 平方米，最终较为完整地发掘出两座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城堡。[①] 史前城址是史前聚落的一种，王城岗龙山城堡的发掘，目的明确，面积广大，发掘和研究过程当中注意到了同时期遗存的共存关系，从聚落考古的角度讲有了明显的进步。然而，也应看到实际上王城岗龙山城堡只是王城岗遗址的一部分，而王城岗遗址又只是八方村遗址的一部分，发掘者只是发掘了王城岗龙山城墙及其以内的遗存，未能对城墙以外的遗存一并发掘和研究，这种发掘方法不能不影响到对王城岗城堡总体布局及其性质的正确认识。

郑洛地区聚落考古第一阶段的另外两项重要成果是新郑裴李岗[②] 和密县莪沟北岗[③] 两处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裴李岗遗址经过 1977－1979 年前后三次发掘，发掘面积总计 2615 平方米,结合 1978年的钻探材料，得知该遗址由居住区和墓地两部分组成。东部是居住区，遭后期破坏严重，仅发现一座残陶窑和几个窖穴等少数遗迹。西部是墓葬区，墓葬按一定顺序排列。但墓葬区中部遭后期严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② A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 年第 2期。B,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裴李岗遗址 1978 年发掘简报》,《考古》 1979 年第 3 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84 年第 1 期。

③ A 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79 年 5 期。 B,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 (1),1981 年。

重破坏，加上第一、二次发掘时未能交待清楚墓葬的层位关系，也给进一步分析墓地的平面布局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裴李岗遗址发掘工作开始不久，密县莪沟北岗遗址的发掘也随即进行。经 1977 年 11－12 月和 1978 年 3－5 月前后两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 2747 平方米，几占遗址现存面积(约 8000 平方米)的三分之一。发掘结果表明这里同裴李岗一样，也将居住区与墓葬区分开，而且在居住区中发现了 6 座房基，发掘者在第一、二次发表的发掘报告① 中，叙述莪沟北岗聚落形态的大势是房基位于遗址中部，墓葬区位于遗址西部或西北部，灰坑和窖穴大多位于遗址的中部和南部。可是发掘者在第三次发表的发掘报告中却因个别灰坑、墓葬与文化层存在打破叠压关系，结合“从出土遗物看，房基、灰坑和文化层的器物是比较一致的，而与墓中的随葬器物比较，除有相同者外，还存在着一些差别”②，从而推论出整个遗址的房基和灰坑晚于墓葬。不管怎么说，发掘者已试图复原整个聚落的分布格局，则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阶段关于郑洛地区史前聚落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文章，极为少见。杨鸿勋在《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对郑州大河村、偃师汤泉沟和洛阳孙旗屯所发掘的仰韶房屋进行了复原和比较研究，是难得的一例③。

第二个阶段，是郑洛地区聚落考古的提高阶段。本世纪 80 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在北京大学系统介绍外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④，此后中国的聚落考古工作再次取得长足进展。具体到郑洛地区，大约从 80 年代中期以后聚落考古研究亦渐渐有所提高，其标志：一是对第一阶段大面积发掘的重要遗址和墓地从聚落考古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二是涉及郑洛地区史前聚落研究内容的专题性和综

① 同上页注④ A。
② 同上页注 ④B。
③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 年。
④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 年。

合性聚落考古研究论著不断增多，三是近年来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自觉运用聚落考古作业方式从事田野调查和发掘,并已初见成效。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继王城岗龙山城堡发现不久，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①、内蒙古包头市阿善城址②、凉城县老虎山城址③、山东寿光县边线王城址④ 等一系列龙山城址相继发现，学术界围绕着这些龙山时代城址的年代、布局、性质和职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⑤。在这些讨论当中，不乏对王城岗城堡建筑技术和形态布局等方面的论述。关于大河村遗址，也有人依据已发表的资料，探讨房基间的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关系，重新梳理大河村遗址不同时期房屋之间的早晚关系和共存关系⑥。关于裴李岗墓地，有人认为该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3 期。

②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2 期。

③ 田广金:《凉城县老虎山遗址 1982－1983 年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 年第 4 期。

④ 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文物报》1988 年 7 月 15 日第 3 版。

⑤ A,京浦:《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文物》1984 年第 2 期。

B,马世之:《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试析——兼论登封王城岗非夏都阳城》,《史前研究》1984 年第 2 期。

C.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文物》1984 年第 2 期。

D,李绍连:《淮阳龙山城与登封小城堡》,《中州学刊》1984 年第 4 期。

E,董琦:《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文物》1984 年第 11 期。

F,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5 年 12 月。

G,曹桂岑:《论龙山文化古城的社会性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8 年。

H,董琦:《论我国史前时期的城堡》,《北方文物》1988 年第 4 期。

I, 董琦:《王城岗城堡筑墙技术源流》,《江汉考古》1989 年第 1 期。

⑥ 贾峨:《关于郑州大河村若干房基相对年代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 年第 1 期。

墓地是由若干墓区组成的，其中下层墓地可分为四个墓区；上层墓地分东、西两片，每片均含 3 个墓区。裴李岗墓地存在墓区-墓片-墓地三个层次，反映出裴李岗人存在着家族-氏族-胞族(部落)三级社会组织。①

自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与聚落考古有关的专题性论著日见增多。其中不少涉及到对郑洛地区的史前聚落各个方面的研究。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马世之较早论述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从“村”到“城”的变化。他指出：“仰韶文化的村落均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并有比较合理的布局”；到了龙山文化阶段，城堡开始出现，说明当时的聚落形态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具体到王城岗遗址，他认为：“王城岗小城堡规模甚小，除了发现象征着城墙建筑遗存的部分基础槽及一些灰坑和窖穴外，至今还没有找到宫殿、宗庙、官邸、贵族陵墓及手工业作坊的线索，因而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此乃夏都阳城”②。

周星发表《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住宅形式与聚落形态》一文，认为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住宅形式经历了从半穴居经浅穴居到地面居再到高台居的曲折发展，由于前仰韶诸文化的住宅大都采取半地穴形式，因此不同意以前有人提出的时代越早，穴居程度就越深的观点；他还认为“仰韶文化的聚落高程低于前仰韶文化，可能是由于河谷较阶地更适宜于原始农业的进步”，“水井的发明便使得聚落得以向平原纵深地区发展，以至住在他们认为方便的任何地方”。此外，文中还提到了郑洛地区个别聚落遗址的具体情况③。

严文明先生于 1987 年撰写了《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一文，文中不仅举例分析了洛阳王湾 F15、荥阳点军台 F2、大河村 F13、

① 朱延平：《裴李岗文化墓地再探》，《考古》1988 年第 11 期。

② 马世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村”与“城”》，《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 年特刊。

③ 周星：《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住宅形式与聚落形态》，《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 1987 年。

F15、F19-20和 F1-4 等多座房屋，还重点分析了大河村三、四期的聚落形态，指出大河村遗址三、四期很可能由东、西两个聚落所组成，可称之为双生聚落遗址，二者以遗址中部偏西的一条西南-东北向的古河道为界，各自拥有自己的居住区和墓地。严先生还认为，临汝阎村遗址很可能是仰韶前期嵩山周围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大河村遗址则可能是仰韶后期郑州左近聚落群的中心聚落。仰韶前期聚落群遗址并不密集，中心遗址并不多见，而且在规模和建筑规格等方面也并不十分突出；仰韶后期聚落群已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心聚落也已发展到比较突出的地位。[①] 严先生这篇论文虽然是对整个仰韶文化房屋和聚落形态所作的综合研究，但实际上已包含了对郑洛地区仰韶文化单体房屋建筑、单个聚落形态以及聚落间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的丰富内容。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冈村秀典[②]、宫本一夫[③]，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刘莉[④] 等人也在相关论文中，涉及到对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研究，特别是刘莉在《中国北方的聚落形态、酋邦演变和早期国家的发展》[⑤] 一文中，主要依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公布的龙山文化遗址材料，对郑洛地区龙山时期的聚落按照遗址面积大小进行分级和分群，并运用西方流行的酋邦理论阐释不同级别、不同区域聚落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显得颇有新意。但由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所载遗址面积常常是将同一遗址当中不同时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合在一起计算出来的，往往大于某一时期聚落

①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冈村秀典：《仰韶文化の集落构造》，《史渊》第128辑，1991年。

③ 宫本一夫：《新石器时代の城址遗迹と中国の都市国家》，《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3)，25－46页。

④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酋邦社会的发展》，《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⑤ Li Liu, "Settlement Patterns, Chiefdom Vari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tates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6 (15): P237－288。

的实际面积，因此仅仅拿地图集所云遗址面积大小来划分聚落等级，难免基础不够牢靠；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哪个聚落是中心聚落，由它来控制次中心聚落和聚落群就更显得证据不足了。

严文明先生最近发表的《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一文[①]，既是对中外聚落考古历史的简要回顾，也是对聚落考古方法论的明晰阐述。严先生明确指出："所谓聚落考古，一般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一)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二)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三)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他还就如何进行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作了具体论述。在论及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聚落遗址数量和分布的差别时，特别提及河南新石器遗址数量和分布的变化："以河南省裴李岗、仰韶和龙山三个时期的遗址为例，其数量各为 70 余、800 和 1000 处左右。如果考虑到三个阶段所占时间跨度的差别，则同一时段的遗址数目之比当为 1∶8∶20，可说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在分布上，裴李岗文化主要在河南中部，仰韶文化则以中西部最密，到龙山时期就大规模向北部和东南部平原地带扩展。"严先生在这里虽是针对整个河南省而言的，但具体到郑洛地区，个中道理显然同样适用。

除上述所举之外，还有不少论著或多或少地论及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加上聚落考古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自觉运用聚落考古作业方式，从事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全貌的田野发掘工作，新安县妯娌遗址的发掘便是其中的一例。妯娌遗址位于孟津县西北约 30 多公里的煤窑乡妯娌村北黄河南岸的高台地上，面积约三万平方米。发掘者在发掘之前，便制定了大规模发掘的周密计划。发掘过程当中，注重同期遗存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揭露出一处由居住区、仓窖区、石器加工场和墓葬区等聚落单元所组成的相当完整的仰韶晚期聚落遗址[②]。标志着郑洛地区田野考古工作迈

① 严文明：《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 1997 年。

②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年 4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了一个新台阶。

综上所述，郑洛地区聚落考古经过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艰苦探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无庸讳言,郑洛地区聚落考古工作较之于国内其他地区仍显得比较落后，特别是在综合研究方面，迄今为止连一篇专门论述郑洛地区史前聚落的文章也没有。这是否说明郑洛地区尚不具备综合研究的条件呢？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就现有工作基础而言，郑洛地区无疑是我国境内从事区域性聚落考古研究的最为理想的地区之一。

第二节　现有工作基础及本文任务

如前所述，郑洛地区新石器遗址的调查最早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渑池仰韶村及其附近遗址的调查①。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③ 和北京大学④ 等先后数次组织田野考古调查，特别是由河南省文物局于 1984 年主持进行的全省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又发现了大量新石器遗址，调查结

① 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夏鼐)：《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2 卷 9 期，1951 年。

② 郑州市文物工作组(安金槐)：《一年来郑州市的文物调查发掘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4 期。李健永：《河南洛阳专区今年以来先后发现多处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0 期。贾峨：《河南伊阳汝河沿岸古遗址调查纪要》，《考古通讯》1958年第 1 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A,《1959 年豫西六县调查简报》，《考古》1961年第 1 期。B,《伊河下游几处新石器遗址的调查》，《考古》1964 年第 1 期。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 年第 1 期。

④ 北京大学历史系洛阳考古实习队：《河南偃师伊河两岸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1964 年第 11期。

果绝大部分反映在 1991 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①]一书中。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各地文物考古部门，仍不断有新发现，其中巩义市文管所等单位于 1991－1992 年在巩义市境内坞罗河流域和洛汭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当中新发现不少新石器遗址[②]。九十年代的另一项重要考古工作，是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对淹没区古文化遗存进行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其中也新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③]。据作者初步统计，截至 1998 年，郑洛地区至少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736 处，其中包含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见附表一）。在上述 736 处遗址当中，至少有一百多处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其中不少已发表了发掘资料（附表二）。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往调查或发掘出的遗址中，绝大部分只披露发掘区范围内的遗存状况，发掘区之外的情况很少介绍，至于调查材料就更为简略，因此仅靠以往公布的材料，往往难以了解遗址全貌，于是作者于 1997 年秋至 1998 年春，奔赴郑洛地区所属各市县，在当地文物考古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实地复查了一百多处遗址，并且对其中一些重要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以期对某些重要遗址的聚落布局大势有所了解。

除了田野工作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外，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详见下文），包括聚落考古在内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从而为进一步开展聚落考古综合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①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年 12 月。

② 巩义市文管所：《巩义市坞罗河流域裴李岗文化遗存调查》，《巩义市坞罗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存调查》，《巩义市坞罗河流域龙山文化遗存调查》，均见《中原文物》1992 年第 4 期。又，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处：《河南巩义市洛汭地带古代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9），1995 年。

③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年 4 月。

有鉴于此，本人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郑洛地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四个时期聚落形态的演变作一初步的综合研究。

第一章　自然生态环境

郑洛地区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大体介于北纬 33°33′～35°16′，东经 110°40′～113°20′之间，北过太行山抵山西省境内，西隔崤山与三门峡市接界，南越伏牛山与南阳盆地相连，东至焦作、郑州、许昌和平顶山一线，已进入华北大平原的西部。据地理学者研究，包括郑洛地区在内的豫西地区地势的基本轮廓"早在距今 1.5 亿年前后的燕山运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经过第三纪中期的喜马拉雅运动和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强烈影响，奠定了今日地貌的基础。第四纪冰期以后，在伏牛山以北至太行山一带，堆积了大量黄土，构成史前时期本区地表的基本形态。进入全新世以来，本区地势、地形的基本轮廓没有突出的变化。"①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研究表明，郑洛地区是我国夏代文明的诞生地，也是商、周文明的腹心地带。三代之后，仍是许多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而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享有"中国"、"中州"和"天下之中"的美誉。

将郑洛地区称之为天下之中，首先就在于它地理位置适中。这里地处中原腹地，从东西方向看，正好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地带；从南北方向看介于我国最大的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这里自然成为我国南来北往、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而众多的河流使水上交通极为便利。

多山是郑洛地区地貌状况的第一个特点。郑洛地区的山脉在总体上呈扇状山文结构分布。其中呈西南-东北向的山脉有太行山、崤

① 黄以柱：《略论豫西地区环境的变迁与对策》，《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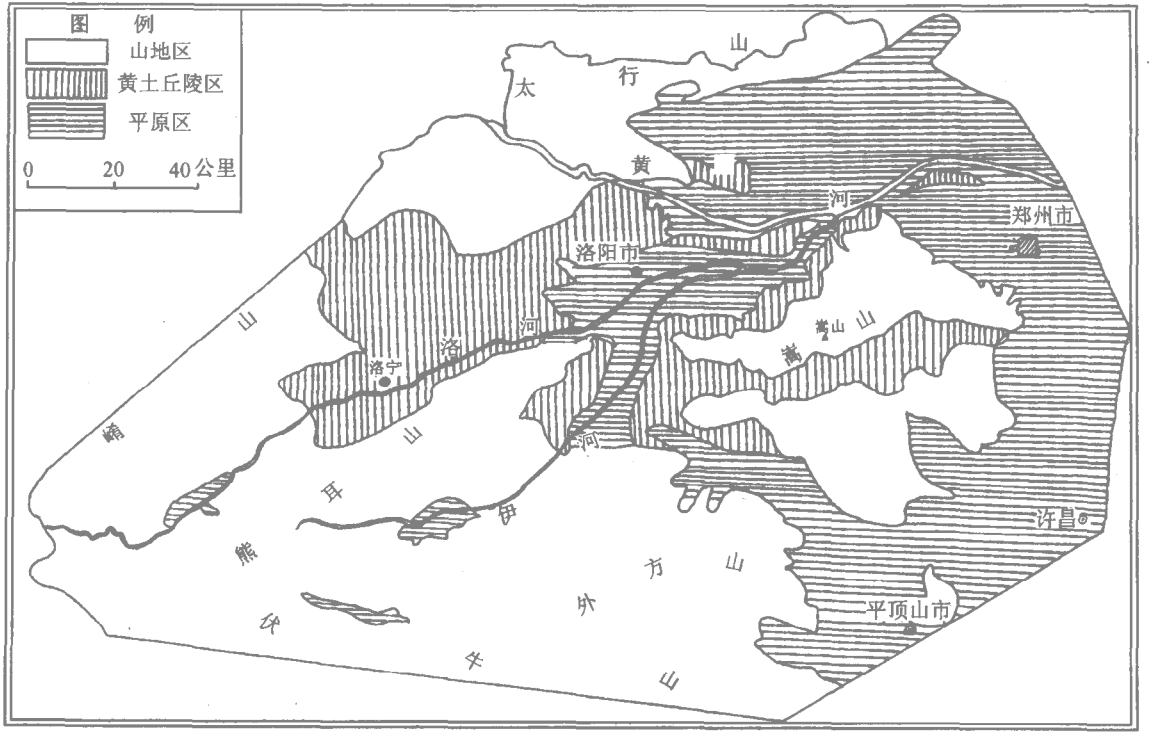
图 例
山地区
黄土丘陵区
平原区
0 20 40公里
太行山
黄河
郑州市
洛阳市
洛河
嵩山
洛宁
崤山
熊耳山
伊河
伏牛山
方山
平顶山市
许昌

图 1-1 郑洛地区地貌图

山、熊耳山、外方山、嵩山，另有西北-东南向的伏牛山。[①] 太行山位于最北边，以低山为主，构成我国黄土高原东南边缘与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崤山山脉，分布于三门峡市与渑池县之间，一直延伸到黄河岸边，长达 160 余公里，宽约 40～50 公里，构成了郑洛地区的洛河与三门峡地区宏农涧河的分水岭，也把郑洛地区与三门峡地区分割成相对独立的两个地理单元[②]。伏牛山脉是秦岭延伸到河南省的一条重要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长 200 余公里，宽约 40～70 公里[③]，其北面与熊耳山和外方山交汇，南与南阳盆地相接。它是郑洛地区大致的南界，也是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的重要分水岭。

上述三列大山分别向郑洛地区的东北、西部和东南方向延伸，宛如在郑洛地区的北、西、南三面耸起 V 形的屏障，向东为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但，郑州左近即为黄河冲击扇平原的西部顶端[④]，郑州以西基本不受黄河摆动的影响。这种地貌分布使郑洛地区成为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易守难攻的态势，极富战略意义，故成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广大的山区蕴藏着大片的森林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据研究，在距今 3000 到 8000 年前后，包括郑洛地区在内的豫西地区"是一派森林茂密、动物繁多的景色。"[⑤] 这在古代社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天然采集和狩猎基地。这些条件不仅有利于采集和狩猎经济的发展，也为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准备了条件。裴李岗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山区或山前地带，或许即与此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基于裴李岗遗址黍粒(Panicummiliaceam)的发现，有人推测包括郑洛地区

① 参见马程远：《豫西山地地貌的发育和分区》，《河南师大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② 《河南省志·地貌山河志》第 6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③ 《河南省志·地貌山河志》第 75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又注①第 75 页。

④ 王文楷、张震宇：《黄河冲击扇平原浅埋古河道带及其与浅层地下水关系初探》，《河南科学》8 卷 2 期，1990 年 6 月。

⑤ 黄以柱：《略论豫西地区环境的变迁与对策》，《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 年第 1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